

●中國西南邊疆民族經濟文化研究叢書

民族文化學論集

THESE ON ETHNIC
CULTUROLOGY

主 编: 张文勋

副主编: 黄 泽 张胜冰

雲南大學出版社

●我国古代“文化”概念的形成和演变

张文勋

—

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似乎还没有十分明确的界定。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人类学的内容也包括了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几乎也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化学的内容。陈国钧先生在《文化人类学》^①一书中,除总论之外,分原始语言文字、原始物质文化、原始社会组织、原始宗教信仰、原始艺术活动等五个部分去论述,是否可以这样说:文化人类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人类的文化现象;那么,我们说的文化学,就是直接研究人类文化的本身?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它们更多地着眼于人类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随之而出现的文化变迁及人类文化实践活动。而文化学则更多地着眼于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的特性以及其发展规律。我们很难在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立足点和着眼点的不同。

如果我们肯定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加以研究,那么,首

^①台湾三民书局(1977年版)。

先就要对“文化”的概念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然而，这又是一个难题，文化的概念似乎是一个不大确定的模糊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在中西各国就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广而言之，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人类的一切实践和创造，几乎无所不包。日本学者小野佑在讨论“文化”的定义时，引用了西方不少学者的看法：其中爱德华·伯纳德·泰勒说：“所谓文化或文明，在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来说，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及其他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所有能力和习性的复合总体。”^①而有的人则把文化和“生活方式”等同看待，例如克拉克·威斯勒认为，文化是“在史学及社会学领域中所讲的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 (the mode of life of this or that people)”^②。林顿认为：“一个文化即是学到的行动及行动结果的统一形态，其构成要素为特定社会的成员们所拥有，所传授，”是作为“社会的生活方式 (ways of life)·加以继承的”。^③所有这些，都接触到文化的某种特性或某些方面的内容，但很难成为一种为大家公认的权威的定義。其主要原因，我想可能是由于各个国家民族各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对文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也就不能脱离我国的传统观念而照搬外国的观念。我们的文化学也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学，当然，外国的文化学也应该作为我们不可缺少的参照系数，因此，我们有必要把我国对“文化”的观念，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①《日本民族文化史》引Edward .B.Tylor: "Primitive Culture" (1871年)。

②同上书引C.Wissler: "Man and Culture" (1923年)。

③同上书引Ralph Linto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Personality" (1947年)。

二

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化”一词，在我国古籍中，并不是一个常用词，但是从这个词的由来以及和它有关的一些词语概念去考察，可以看出我国使用的“文化”一词具有特定的含义。文化二字连用成词，较早见于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篇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书·束皙传》中也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之句，其含义都差不多，都是把“文化”与“武功”、“武力”对举而言。显然，文化具有文明教化的意思。当我国古代尚未使用“文化”一词之前，与之相接近的词语有“人文”、“文明”等等。

先说“文”。我国先秦时期使用“文”字，并不是单纯地指文学或文章，而是广义的文化概念，当然其中也包括文学和文章。《论语·子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朱熹注云：“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把“文”直接译为“文化”，这是很有道理的。孔子说的是指文王以后的全部文化遗产，也即是朱熹说的礼乐制度之类。《论语·八佾》中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这里说的“文”也是指周代繁荣的文化而言。这些文化内容包括礼、乐、刑、政等方面，而所有这

些又都要靠文字加以记载，成为典籍，传诸后世，所以，后世讲“文”，既是指这些典籍，主要还是说典籍所记载的社会文化内容。肖统《文选序》说：

式观元始，眇覩玄风；冬夕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我们的祖先还处于原始时代时，“世质民淳”，还没有什么文化可言。到传说中的伏牺氏“王天下”的时代，才出现了解释社会现象的八卦和文字，从而也才有了文化。二是把文化的概念和“书契”、“文籍”联系起来，因为它们把生活中的文化现象用文字记录下来，才成为传播和遗传的手段，成为教化的工具。所以古人所谓的“文”，既是指文章、典籍，也是对广义的文化的称谓。我们现在习惯地把读书识字、获取知识，泛称为“学文化”，这自然是和我国古代对于“文”的传统观念有关。

再说“人文”。在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在泛用“文”的概念的同时，往往也使用“人文”一词，这就更接近于我们今天说的“文化”的含义。“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贲卦·彖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

显然，刘勰论文，追本溯源，也是从“人文”的发源开始，而他所说的人文，也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化典籍，所以他也把我国古代文化的肇始，归之于庖牺氏画八卦和文字的产生。所谓“人文”就是有文字典籍文献可考的文化。宋濂在《文原》中也说：“人文之显，始于何时？实肇于庖牺之世。庖牺仰观俯察，画奇偶以象阴阳，变而通之，生生不穷，遂成天地自然之文。”可以说“人文”的概念，基本上接近“文化”的概念，是指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并为文字所记载的一切文化现象，从多方面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方式（或称模式），其中包括生产生活、礼法制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等。所以，人文的概念比笼统地称“文”的概念就更为具体而明确。

最后再说文明。“文明”一词，数见于《周易》一书，有时与“人文”同时出现。例如：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乾·文言》）

文明以健，中心而应，君子正也。（《易·周人·彖》）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行时。（《易·大有》）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贲·彖》）

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易·明夷·彖》）

文明以悦（《易·革》）

由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文明”是先秦时期的常用词，《尚书》中也有，例如“睿哲文明，温恭允塞。”当时用的文明概念，都是表述某一社会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所达到的发展水平，也即是其文化水平。它的重点不在于表现物质生活的自身，而是表现精神文化的内容以及它所达到的水平。孔颖达在《周易注疏》中，常有这样说明：“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和应之。君子正也。”（“文明以健”注疏）“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文明以止”注疏）把“文明”与“威武”相对而言，表明“文明”是通过文化教育而达到的社会发展水平，也即是孔子所赞美的“郁郁乎文哉”那样的理想社会。这就是刘向《说苑》中说的：“先文德而后武力”、“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意思。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常常讨论文治武功的问题，儒家的不少学者主张“文治”而反对“武功”，文治就是通过文明教化，达到治天下的目的，这也就是刘向说的“文化”的涵义了。

那么，“文化”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呢？

“文化”一词从字面看，是由“文”和“化”组成的，显然，有文明和教化两层意思。“文”是其体，“化”是其用，合而言之，就是文明教化的作用。“文”之社会功能正在于“化”。这就是“察人文以成化”的中心思想，我想这也正是“文化”一词在我国古代的原始含义。孔颖达在注疏“化成天下”时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白居易《策林》六十八条中说：“国家化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学，二百余载，文章焕焉”。以文明教化人民，治理国家，这就是“文化”的本质功能。孔子设“四教”，即文、行、忠、信。先秦儒家提倡诗教、乐教、礼教，都属于教化之列。

说到“教化”二字，在我国古籍中早已有之，这表明我国古代重视文化教育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教化”，就是《毛诗序》中说的“教以化之”的意思，那是说《国风》诗的教育作用，事实上，“教化”已是文化教育通用名词，并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重要地位上。《荀子·正论》中说：“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法言·先知》中说：“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议其教化”。《汉书·元帝纪》中说：“宣明教化”。《汉书·礼乐志》中说：“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教化自古以来与政治有关，目的都是为了教育人民，治理国家，所以，有时也称“政化”，诸如“道德昌则政化明”、“政化仁爱，境内清静”、“政化清平，得夷人和”。（俱见《后汉书》）等等。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中提出“政化贵文”、“修身贵文”、“事迹贵文”三条，从广义上说，都与文化修养有关。他说的“文”，泛指用文字记载的各种典籍，而“政化”的作用是首要的。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由“文”、“人文”、“文明”等等变而为“文化”的概念，既包括文明、人文的内容，又含有教化的意思。应该说这就是我国对“文化”的传统看法，和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大差异。

三

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与“文化”概念相关的文明、人文诸概念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些什么？在我国古籍中说的文明与人文，固然也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主要还是指见诸于文字或艺术符号所记录下来的精神产品。这就是我国古人赋予“文”的广义内容。先秦典籍，诸子

百家之书之所以被视作我国古代文化的代表，音乐、绘画、雕塑以至于一些工艺品，也被认为是文化的表征，无疑都是被当作人类精神文明所达到的水平的体现。所以我们今天“文化”的观念，也都侧重于精神文化，透过精神文化再透视物质文化。宋代古文家石介在《上蔡副枢密书》中有一段议论，很可以说明这种观念，他说：

文之时义大矣哉！故《春秋传》曰：“经纬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刚健”。《语》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三王之政曰：“救质莫若文”。尧之德曰：“焕乎其有文章”。舜则曰：“睿哲文明”。禹则曰：“文命敷于四海”。周则曰：“有乎文哉”。汉则曰：“与三代同风”。故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教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悌，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圣人取文者，君子章之，庶人由之。

很明显，石介所说之“文”，就其内容看，涉及很多方面，包括天文地理、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礼乐刑政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文之时义大矣哉”的内容，也即是文化的内容。后来，人们把这里的“文”字，理解为文章、文学，就表面而言，因为这些都是藉诸文字记载下来的东西，成为书本典籍，泛称之为文章。也未尝不可。但严格说来，应该是指文化，因为他们所记载的内容，正是我国古代的各种文化现象。明代学者宋濂写了一篇《文原》，他对于“文”的解释，更接近于文化概念，他说：“故凡有关民用及一切弥纶范围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别有其他也。然而事为既著，无以记载之，则不能以行远，始

托诸辞翰，以昭其文”。他举例说：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后笔之为《禹贡》之文。周制聘觐燕享，饔飧昏丧诸礼，其升降揖让之节，既行之矣，然后笔之为《仪礼》之文。孔子居乡党，容色言动之间，从容中道，门人弟子，既习见之矣，然后笔之为《乡党》之文；其他格言大训，亦莫不然，必有其实，而后文随之；初未尝以徒言为也。

这就是说《禹贡》中记载的是夏禹兴水利、刊木开荒的功绩，属生产生活方面的文化。而《仪礼》所载，则是关于周代的礼法制度方面的事，属政教方面的文化。而《乡党》（《论语》的一章）所载，是孔子教育学生的一些言行，属道德修养方面的文化。概括言之，前者属物质文化的范畴，后者属精神文化的范畴，它体现出从夏代到周代文化发展的轨迹，由较原始文明到较高水平的周代文明的变迁过程。可见，古代的文化除了一部分保留于实物（如出土文物、文化遗址等）之外，主要是保留于文字记载的典籍之中。所以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多半要以文字记载的资料为依据。研究先秦文化，就不能不以《六经》及诸子之文为主要依据，因为其中记载了丰富的历代文化资料。《周易》之所以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文化典籍，就在于它保存了孔子以前漫长岁月中的中华早期文化。我们的祖先创造了阴阳八卦变化的学说，去解释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中可以看到我国最古老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对此，宋濂在《文原》中作了如下描述：

人文之显，始于何时？实肇于庖牺之世，庖牺仰观俯察，画奇偶

以象阳阴，变而为之，生生不穷，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舍括无遗，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诸《乾》、《坤》；上栋下宇，取诸《大壮》；书契之造，而取诸《夬》；舟楫牛马之利，而取诸《涣》、《随》；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诸《小过》、《大过》；重门击柝，而取诸《豫》；弧矢之利，而取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民彝之叙，礼乐刑政之施，师旅征伐之法，弗牧州里之辨，华夷内外之别，复皆则而象之。

宋濂把我国天文之始，归之于庖牺氏画八卦，这是传统传说，而诸卦之彖文和文言等重要的文献，则是周秦时期重要的文化文献。从宋濂的解释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周易》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古文化内容：《乾》《坤》二卦，内容属治国之道，所谓“垂衣之治”就是把圣人治理天下和天地化生万物之大道联系起来，这可能就是后来一切统治者或起来反抗的被统治者，总是要打着“受命于天”、“替天行道”的旗帜的思想来源。我们只要举乾卦的内容就可获得其中信息。卦文中都讲到“龙”，如“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等等。再看其它一些解释文字：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乾·彖》）

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

(《乾·文言》)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乾·文言》)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乾·文言》)

总括而言，《乾》《坤》以天地之道，象征人间至尊者治理天下之道，以龙象征统治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品德。这是我国古代社会由原始时期过渡到阶级社会所产生的社会意识的反映，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观念，无疑也是那个时代文明的一种标志。所以《易·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我们再看《系辞》中对上述诸卦的解释，就更清楚了。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

取诸《涣》。乘牛服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仅上述材料，就已涉及宫室建筑、文字书契、交通运输、民生丧葬、防盗设施、武器制造等等。这一切，不就是我国远古时期的文化内容么？由此可进一步看到《周易》是一部最古老的最全面的上古文化的总结，它使我们看到我国上古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大致面貌。

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回到正题上来：究竟如何界定我国的“文化”概念？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其内涵是什么？前面已经说过：“观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基本包含了我国使用“文化”一词的特定含义，凡属一切人文现象，经过总结提高，成为相对固定的模式；反过来，又用以教育人民，起教化的作用，就属于文化的范畴。例如人类最早是穴居野处，后来能营建房屋，从简陋的房屋到华丽的宫室殿宇，这都是人类文化的发展

变迁，它蕴含着人类的智慧和理想，所以建筑艺术，是人类文化的体现。

“文化”的内容究竟如何界定？克拉克·威斯勒提出一个所谓“普遍的文化模式（universal pattern of culture），其内容包括语言、物质生活、艺术、神话、宗教、社会组织、财产、政府、战争等九个方面。日本小野佑从十个方面探讨日本民族文化史：①时代论；②景观论；③民族论；④语言论；⑤国家论；⑥日常生活论；⑦宗教论；⑧社会组织论；⑨经济论；⑩艺术论。（《日本民族文化史》）其实，这些归类法，都没有超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范畴，只是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罢了。

我国“文化”概念的内容，固然也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但主要侧重于精神的方面，物质的方面也要转化为精神的东西，才属于文化的内容。我们现在习惯用法，把读书识字，获得知识，都看作是有文化，一个人有无学问，看作是文化水平高低的表现。虽然，这些都不能说是“文化”的严格含义，但是，它表明文化是侧重于精神的意识形态的方面。所以我国古代讲“人文”、“文明”则总离不开以《六经》为典范。今天我们谈文化，也主要是指哲学、政治、科学、艺术、宗教、伦理道德等等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当然，这些都和物质生活分不开。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本文主要是就我国古代“文化”概念的形成，提供一点资料，并不是对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我国文化作总体的研究。所引的资料也只是根据典籍所载，并没有包括田野调查所得的大量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资料。

（作者系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略论民族文化的全民性与整体性

——对“两种民族文化”论的再认识

熊锡元

“文化”一词，涵义广而且深。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学术界至今对它并没有一个圆满的一致的界说，只存在一个为多数人所公认的大的概念——“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按此概念，一般认为“文化”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化就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两大类。狭义的文化即指精神文化，它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军事、哲学、科学、教育、道德伦理诸领域中思想意识形态和相应的制度与组织，以及文学、艺术思想和产品。在不少文化门类中，还存在着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二者兼备的现象，例如衣、食、建筑艺术、雕塑、乐器与音乐，等等，既包括物质构成，又是精神的（思维、设计、规划等脑力活动）产物。

为了更加明确认识“文化”的内涵，我们不妨将它大体区分为不同的门类，这至少有如下十余种：语言文字、物质生产文化、衣食住行文化、科技与教育文化、军事与兵器文化、医药文化、婚丧嫁娶文化、节庆礼仪文化、文学艺术（在文化中占

很大份量和重要位置)、建筑风格、体育娱乐与旅游文化、宗教文化、名胜古迹文物,以及其他风俗文化。这些都是人们公认的,经常提到的文化门类。此外还可以加上被人们忽略了“国家管理文化”,以及新兴的“信息文化”。

世界上没有无文化的民族,不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也是不存在的。人类社会文化的多元性,除其他因素外,就是因为民族各异而有多种多样。所谓民族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模式,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民族的生活方式或样式。

文化不仅表现一个民族的外在风貌,而且是它内在的“灵魂”。一个民族的成员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都受其文化模式的制约。

民族文化在本民族内部有巨大的凝聚作用,对别的民族又具有特殊的魅力,可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心理感情的沟通。

文化使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在历史的舞台上显露自己多姿多彩的“个性”,形成其自己的传统,同时丰富着全人类的社会生活。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个性”,因此,一提到某个民族,除了外貌、体质等特征之外,我们面前自然就会展现一幅该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图景。譬如说到蒙古族,其文化模式的图景就是:畜群、草原、牧歌、马头琴、蒙古包、烤羊肉、奶茶、摔跤、骑射、那达慕大会、喇嘛教、历史悠久的蒙古文字、当年叱咤风云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还有许多民族,几乎同它的某一两种风俗文化同义,例如藏族——哈达;傣族——泼水节;汉族——春节、雕梁画栋与楼台亭阁式建筑;回族——

清真寺；苗族——芦笙歌舞；壮族——歌圩；白族——三月街；侗族——风雨桥，等等。这里列举的某一两种特殊民俗文化，对各该民族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象征意义。世界各地的民族，也有与此类似的情况。

以上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涵义作了一个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需要明确，这就是怎样认识文化的阶级性和民族文化的全民性与整体性。本文主旨即在于此。

学界人士都熟悉，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这篇著作中，论述了“两种民族文化”。列宁说“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例如，在俄国，“有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也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列宁还指出：“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这段话中，列宁用来说明“文化成分”含义的是“思想”一词，可见他所说的文化不是广义文化，既不包括物质文化也不是指全部精神文化，而是指思想意识、观念形态这部分文化。在列宁看来，区分两种民族文化的意义是在于：一方面揭露资产阶级利用民族文化口号亦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去影响和欺骗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则是“要从每个民族的文化中只吸取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以便同“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相对抗”。

20 世纪初、十月革命前，列宁从资本主义俄国两大阶级对立和文化思想领域矛盾冲突的情况出发，在论述民族文化问题